

前 言

深圳是一座美丽的新兴城市 她的姿影 光彩照人 她的辉煌，举世瞩目。

本书内容上下五千年，涉及深圳古代和近代的历史，但简略而不系统。最主要部分，是写创办深圳经济特区以来风驰电掣的十几年创业史、发展史。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客观地记录下深圳的昨天，从而满怀信心地展望明天、奔向未来，更高举起爱国主义的旗帜，朝着现代化国际性城市和国际文化名城的宏伟目标前进！

本书第 1、2 章由邢凤麟执笔 第 3、4、5、6 章由胡大钺执笔 第 7、8 章由叶锦诚执笔。全书由邢凤麟主持编写工作，拟定提纲、负责组稿、修改补充和定稿。深圳市委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李统书同志在百忙中为本书作序；《深圳特区报》理论部韩松主任和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徐森忠研究员审阅了部分书稿；中国城市史丛书编委会主编陈宝辉编审一直关心、指导并审阅本书全稿；北京师范大学张守常教授也审阅本书，并提出宝贵的意见。在此表示我们衷心的感谢！

我们十分感谢深圳安远建设发展公司的鼎力支持，使本书得以顺利出版面世。本书编写和出版过程中，还得到许多同志的帮助 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部分内容的编写 曾参考了《深圳掌故》、《香港史略》、《香港问题始末》、《九龙海关百年大事记》、《深圳大事记》、《深圳统计

手册》以及多种著述、资料 and 文章 在此向有关部门、单位和作者谨致谢意！

本书内容止于 1993 年。封面图片为“南国明珠不夜城深圳”。
由于作者水平所限，书中错漏在所难免，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1995 年秋于滨河

第一章 优越的自然条件 特殊的地理位置

一、深圳名称的由来

深圳经济特区在创立和建市以前称宝安县，清代称新安县。据清朝康熙年间编修的《新安县志·地理志》所载：“惠民桥 在深圳，河沟深浚 凡遇雨潦潮涨 往来维艰 更有不知深浅 动遭淹溺。康熙二十八年 巡检廖膺宠建选石桥 名曰‘惠民’。”由此可知 深圳名称的出现 距今已有 300 年以上。廖膺宠是官宦 新安县赤尾 巡检司巡检，他主持修建的惠民桥，即今人民桥，河沟即今深圳河。“圳”与“圳”同 即田边的水沟 川流 深圳一词原指深沟。现深圳市与香港新界接壤，其间田连阡陌，自东向西以深圳河为界，历史上河两岸均属新安县，水陆交通方便。随着集市贸易和居住人口的发展 河的北岸形成墟市 当地人称为“深圳墟” 这条 20 多公里的狭长深沟便称之为“深圳河”。

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现深圳市总面积为 2020 平方公里，位于东经 $113^{\circ}46'$ — $114^{\circ}37'$ 北纬 $22^{\circ}27'$ — $22^{\circ}52'$ 东临大亚湾 西接伶仃洋 又有大鹏湾和深圳湾环抱其间，是珠江出海口上一个天然的深水良港，古往今来就是南中国的一扇门户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一处交通孔道。深圳经济特区在深圳市的南端，位于东经 $113^{\circ}52'$ — $114^{\circ}21'$ 、北纬 $22^{\circ}25'$ — $22^{\circ}39'$ 东起大鹏湾背仔角 西连珠江口的安乐村 东西长 49 公里 南北宽平均 7 公里 总面积为 327.5 公里 是深圳市沿海地带的滨海平原，土地坚实，红花岗岩的风化土层，有利于开发工

商、房地产等各种用地的需要。

深圳市与今天国际著名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香港山水相连、唇齿相依、习俗相近、优势互补。昔日就有过境耕作、捕捞、互市、贸易乃至通婚的密切联系。深圳和香港仅一水之隔，两地在交通运输、人员往来、资金进出、商品流通、信息交流等方面尤为便捷。特别是深圳定为我国开放改革最早的试验区和最大的经济特区，开改革开放风气之先而成为联系香港、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地，引进资金、技术、人才和先进的管理经验的基地和窗口。例如创办深圳经济特区以来，香港注入深圳的资金约占深圳利用外资的 8 成以上，说明了除优惠政策和土地、劳力价格低廉等基本条件之外，深圳毗邻香港，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地利因素。

三、充沛的雨量 潮润的气候

深圳属于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常年平均气温为 22.4°C 最低温度为 1.4°C 最高温度为 36.6°C 每年 5 月至 9 月为雨季 虽然气温炎热，但由于有海洋气候和雨季的调节，气温潮润凉爽。

深圳的雨量 年平均为 1948.4 毫米，常年主导风向为东南风，雨量充沛，风调雨顺，而且日照时间较长，年平均日照为 2120 时，太阳总辐射量为 542 焦耳/平方米。夏秋季的台风，因有山峦阻挡，所以直接袭击深圳市区较少 年平均只有一次。因此 深圳的气候，全年大部分是风和日丽 夏有秋凉 冬有春暖 温和宜人。

四、辽阔的海洋 丰富的资源

深圳北面靠山，其余三面临海，西和西南面是珠江口的伶仃洋 东和东南面是大亚湾和大鹏湾 海岸线长达 248.3 公里 海域面积有 102.89 平方公里 海洋资源非常丰富。据考察 具有良好的天然条件、可建大型深水港的有妈湾、蛇口、赤湾、大梅沙、土围、西（溪）涌、大鹏湾和盐田等多处 另有塘仁涌等十多处 可建中、小型

海港，是发展水陆客货交通运输和外向型经济的有利条件。

深圳海域辽阔、水产资源丰富，是个巨大的聚宝盆，主要的海产品有鳐鱼、蛇遛、兰园鲈、金色小沙丁、金钱鱼、大眼鲷、二刺鲷、带鱼、盲曹、鲈鱼等三、四十种名贵鱼类，还有虾、蟹、蚝和藻类。发展水产养殖、海洋捕捞等渔业具有广阔的前景。海水资源方面，化学元素有数十种之多，微量元素和稀有元素也很丰富，还有原子反应堆中最好的中子减速剂、热核反应燃料氘（重氢）等主要原料的重水资源，以及潜力很大的水电资源等。

深圳依山临海，山青水秀，风光旖旎，旅游资源也十分丰富。目前已开发的有东湖、银湖、香蜜湖、西丽湖、石岩湖和小梅沙、西（溪）涌、深圳湾、蛇口等旅游胜地，合称“五湖四海”。滨海的大小梅沙、溪冲、迭福、水沙头等黄金海岸，连片沙滩宽 30 至 50 米，长 1000 至 3000 米，其中小梅沙海水清澈、沙白柔软、风和日丽、景色迷人，有“东方夏威夷”的美誉。

深圳湾畔的红树林，是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面积 4564.3 亩，是东半球的候鸟南来北往的迁徙歇脚和栖息地，其中有 11 公里长的珍稀濒危植物红树林带和乔木林地，是一座海滨的绿色长城，对净化水质和空气也有重大的意义。另有 1700 多亩的基围水洼地和大片海岸滩涂，为各种候鸟提供鱼虾类等多种丰富的食物。这个自然保护区内有 180 种以上的鸟类，其中有 20 多种被国家乃至国际列为珍稀濒危的重点保护鸟类，是多种虫害的天敌。深圳湾红树林自然保护区不仅在全球生态保护方面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城市的腹地有这么好的自然保护区也是举世无双的，是一项不可多得的珍贵旅游资源。

五、土地资源和地下矿藏

深圳全市面积约等于两个香港，其中可耕地包括水田、旱地、菜地，面积 42.99 万亩，其中特区内可耕地面积为 14.62 万亩。全

市园地(包括果园、茶园、花园)有 9.746 万亩 林地 14.62 万亩。深圳盛产的龙岗三黄鸡、南山荔枝、石岩沙梨、龙华方柿等,远近驰名 还有属国家级野生保护动物的虎纹蛙和蟒蛇、猕猴、大灵猫、金钱豹、穿山甲等,此外还有较大经济价值的两栖动物 5 种、爬行动物 23 种、鸟类 30 种、兽类 33 种。

深圳境内已探明的矿藏有 27 种 矿点(区)100 多个 其中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如铁、锰、钨、锡、铋、钼、铜、锌、铅、金、银、汞、钽等矿种 15 种 非金属矿有大理石、石灰岩、白云岩、高岭岩、钾长岩、水晶、冰洲石粘土、泥灰土、煤、石英沙、黄铁矿和花岗岩等 地下矿藏品种繁多,应有尽有。

六、名胜古迹

深圳境内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至先秦古遗址有 100 多处 革命遗址 80 多处。其中列入市级的文物保护单位 34 处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 处。比较重要的有咸头岭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分布范围约 2000 平方米 沙丘文化的遗存比较典型。其次铁仔山古墓区有墓葬百余座 随葬品的出土文物多件 其中汉代“熹平四年”纪年墓砖和带有民族特点的人头画像墓砖具见特色。赤湾的天妃庙(即妈祖庙)遗址 始建于明永乐年间 历年扩修 规模宏大 居岭南数十处天后宫之冠。与天后庙相对有后人修建的宋少帝陵,是纪念宋少帝 昺 崖门投海殉难而建的公园式陵园。

另据康熙年间修的《新安县志》所载 明清时有“新安八景”杯渡仙踪、赤湾胜概、梧桐天池、参天乔木、卢山桃李、龙穴楼台、鳌洋甘瀑、玉勒温泉。这些景观 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更易 留下来的赤湾胜概、梧桐天池、玉勒温泉等胜景 则愈来愈生辉增色 吸引着无数游客留连忘返于其间。

第二章 勤劳的人民 光荣的历史

一、深圳的历史沿革

大约在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深圳地区已有原始人群活动的踪迹。进入青铜器时代后，深圳成为古越族建立的君侯小国属地。秦始皇三十三年（前 214 年）统一岭南后，深圳归属南海郡番禺县辖地，汉袭旧制未改。三国时属东官郡辖地、西晋时改属番禺县地。东晋时又建东官郡，首县宝安，深圳前身为郡治所在。南朝的宋、齐、梁、陈和隋朝均属东官郡宝安县。唐至德二年（757 年）改宝安为东莞，属东莞县辖地。中经五代十国的南汉和宋、元、明，直至明万历元年（1573 年）分东莞县立新安县，辖地包括今深圳市和香港。清康熙时曾一度并入东莞，不久复置。民国三年（1914）改新安县为宝安县直至解放。1953 年县治从南头迁深圳镇。1979 年改宝安县为深圳市，1980 年 8 月建立深圳经济特区。1981 年恢复宝安县建制，与深圳经济特区同隶属于深圳市。1993 年撤县建区，分置宝安区和龙岗区二个区，与特区内的罗湖区、福田区、南山区三个区，同属深圳市。市政府所在地位于福田深南中路上。

二、上古时期粤东的行政中心

深圳从新石器时代以后，经过漫长而艰苦的岁月，勤劳的人民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咸头岭、盐田、小梅沙、赤湾、上洞村等海湾古沙堤堆的古文化遗存，包括石镞、石斧、石刀、石簇和大批夹砂和普遍装饰绳纹、划纹、贝印纹粗制的彩陶器，是具有显著特征的沙丘文化遗存，与珠江三角洲的广州地区相埒。从青铜时代的遗址和遗

存来看,包括石器、青铜器、铁器和釉陶器、印纹硬陶等,其造型特征与春秋战国长江流域一带的文化相似,说明这一历史时期中原文化已由楚国传入岭南,其中铁斧和大陶瓮的出现,表明这时岭南地区已进入了农业和渔猎相结合的经济。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岭南设置南海、桂林、象郡等三郡,中原的铁器和牛耕传入岭南,属于南海郡辖地的深圳,也逐渐融合了中原文化。入汉以后,岭南地区进一步开发,南迁的中原人民不断增加,加速了岭南地区越、汉的民族融合和经济的发展。

东晋咸和六年(331年)分南海郡东南地区设置东官郡,辖宝安、兴宁、海丰、海阳、绥安、海宁六县,范围包括今珠江三角洲一部分、惠州至潮州等粤东地区。郡治设于宝安县城南头。宝安县成为粤东六县的首县和行政中心,地位十分重要。

原来秦汉以前南越的先民“靠海吃海”,捕捞、煮盐为业。西汉实行盐铁专卖,南海郡番禺县为全国36处盐官所在地之一,当时的番禺县包括现在的深圳、香港、珠海、澳门、中山、东莞等,番禺县的盐场就设于南头(今深圳市南山区),南头位于海滨,水陆交通称便,且煮海为盐的历史悠久,在汉初大力发展盐铁业的形势下,南头的盐业迅速崛起而成为南海郡一个最大的盐场,从而带动了这一地区经济的发展。到了三国孙吴后期,为了筹措军费,遂于甘露元年(265年)在东官盐场南头,设置了“司盐都尉丞”,专司盐政盐务,扩大税源收入。史称场名为“东官”,意指“东方盐官”,以其地在粤东,故名。这是古代深圳设治的开始,也是城市雏型开始形成的主要标志。当东晋时期分南海郡设置东官郡、郡治设于南头时,东官之名随之称于世,当时,古代的深圳不仅是粤东经济比较发达和主要税源收入的地区,而且又是粤东的行政中心。从东晋至隋开皇十年(590年)废东官郡改属南海郡止,东官郡设置历时259年,其中除齐时郡治设于怀安(今东莞),梁、陈时郡治设于增城外,其余时间东官郡郡治设于南头前后长达170多年的历史。

三、唐宋时期南海对外贸易的交通孔道

秦汉以来中原人民大量迁入岭南，特别是在东晋南渡以后，中原人民南迁出现高潮，从此岭南地区汉、越两族插花式大杂居小聚居、民族融合和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其中，粤东海道和广州对外航线交通发展尤为迅速。唐宋时期，广州已成为南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口岸和交通枢纽，而深圳地处珠江的出海口和广州的门户，是往来商旅船队必经之地，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因而成为对外的交通孔道和贸易纽带。

从东晋到南朝的宋、齐、梁、陈诸朝，都在南方建都立业，因而海上的优势得到较为充分的发挥，从此对外贸易开始从陆路为主转向海上为主。广州地处东、西、北三江汇合点，是内河避风良港，水陆交通十分方便。同时，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出海船只较大，因而多取道海南岛东岸直达广州的新航线，代替过去只能近岸航行的北部湾航线，大大地缩短了航程。到南朝时，广州已逐渐取代粤西的合浦、徐闻，而成为南方海上对外的主要口岸。虽然当时对外贸易的专门机构尚未设置，只由广州刺史和南海郡太守兼管，但已为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勃兴和唐宋时期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盛唐的大统一和经济的大繁荣，举世瞩目，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空前活跃和迅速扩大，广州也发展成为万商云集的贸易中心，并首创了市舶使专司对外贸易事宜。南海诸国、天竺（印度）、波斯远至大食（阿拉伯）商船进出广州，必须经过深圳的屯门（今属香港）停泊储存淡水。所以，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为确保海路畅通和商旅安全，于屯门设立军镇，在编官兵多达2000人，治所设在南头。

当时，每年夏季各国商船满载象牙、犀角、珍珠、琥珀、玳瑁、香料、玻璃和火油（石油）等名贵特产和稀世珍宝，利用东南季风，从波斯湾、印度洋、马来半岛经南海，直达珠江口，再通过屯门进入

广州，经过纳税、抽解和验明后在广州划定的市舶区互市，其中皇室专用品由市舶使或其他专使到场高价收购。我国商品以丝绸、瓷器和铁器为主，还有制药、硝石、炼丹、“中国雪”（盐）、从广州出口西去，也是经屯门出海运往南洋各国、印度洋和波斯湾的。据唐德宗时宰相贾耽的《广州通海夷道》记载，从广州出屯门西行，经海南岛东岸九州石和象石，越西沙群岛，穿过马六甲海峡而至阿拉伯重镇末罗国（今伊拉克的巴士拉城），航程 89 天，从波斯湾航行到非洲东海岸，航程 48 天。这条“通海夷道”即后来所称的“海上丝绸之路”（又称“印度洋之路”）、“陶瓷之路”或“香料之路”，深圳地处要冲，每年中外商旅经过此地络绎不绝，极盛一时。

到了宋代，市舶官制和市舶条例较为周密，宋太宗开宝四年（971 年）6 月在广州设置市舶司，进一步完善市舶建制。指南针的发明和在航海上的应用，使能载千人的大船可以入海航行。尤其宋代对外实行优惠政策，通航的国家和地区大为增加，其中贸易量最大的仍是阿拉伯，其次为三佛齐（位于苏门答腊岛）和阇婆（在爪哇），进出口的商品也大有增加，从广州出口的除大宗的丝绸、陶瓷外，还有金银铅锡和漆器等商品，进口货物以香料为主，还有乳香、玛瑙、珊瑚、苏木、龙脑和珍珠等。

继广州之后，福建泉州、两浙杭州、明州也相继成立市舶司或市舶务。但在唐宋时期，“唯广州最盛”。直至南宋末年，广州对外贸易的中心地位让位于泉州，从此，深圳的海上交通孔道和进出口贸易纽带的地位和作用，才逐渐降低了下来。

四、近古时期广东海防的军事重镇

明朝开国后，为了加强海防边防而设立卫所的军事建制，用“以捍外而固内”。洪武十七年（1384 年），又以岛夷之患，增设广东卫所，计 15 个卫和 100 余个千户所，每卫辖 5 个千户所，千户所下辖百户所。卫所的战士，三分守城，七分屯田，耕战结合。深圳的

南头和大鹏，均为海防要冲，两处均设有千户所，每处屯军 1120 人。其中南头还建立水寨，作为海军基地，有战船 53 艘。至明朝末年增加到 112 艘。南头水寨下辖 6 汛（哨所），肩负东至潮州、西及上下川、南界大洋的海域防务。

明代造船业高度发展，跃居世界的前列，尤以广东造的“广船”多用铁力木和龙骨，能载重和抵挡大风大浪。所造战船，“可发佛郎机（铳）可掷火毯”，船坚炮利。当时广州和东莞的乌尾是广东最大的造船中心，从而给南头和大鹏的海防提供了有力的依托和保障。宋代经济中心南移江南，到了明清，广东经济也迅速发展起来，一年三收两收的水稻和农作物品种不断增多，冶铁、陶瓷、纺织、造船、制盐等手工业生产高度发展，小商品经济空前活跃，冲破海禁出海谋生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从而进一步推动对外贸易的发展。

15 世纪末，随着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和东方新航线的开通，西欧一些处于资本主义原始资本积累的国家，相继东来进行海盗式的活动和殖民扩张，最早来到广东掠夺的是葡萄牙，接着是西班牙、荷兰和英国。明朝正德十六年（1521 年）在深圳终于爆发了第一次反击佛郎机（即葡萄牙）殖民者的屯门之战。原来正德九年（1514 年）佛郎机使者阿尔华列士抵达屯门并占为据点，该国到来的商船和兵船均停泊于屯门。他们的海盗活动甚为猖獗，“剽劫行旅”、“掠卖良民”、“杀人抢船”，殖民者的暴行激起了地方军民的义愤。1521 年 9、10 月间，负责广东海防重任的广东提刑按察使汪鋐奉命出师征讨，驻军于南头城的海南道行署，招募一批民勇，征召一批海船并调集南海卫、东莞所、备倭官军和按察司将士，编成船队，合有三千人，经集训后，由汪鋐亲自率领出征。军民船队从南头出发，迅速包围屯门。佛郎机凭借炮火精良和险要地势负隅顽抗，初时官军不敌失利，汪鋐重整旗鼓，采取扬长避短的战略，先用火攻，乱敌船队，然后以百桨轻舟勇闯敌阵，经浴血战斗，明军大

胜，收复了屯门要塞。佛郎机败退，转而骚扰东南沿海其他地区。

明万历三十年（1602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后，遂染指广东。由荷兰殖民者组成的海盗船队直闯佛堂门后，深入到深圳湾，企图劫掠南头城。南头一带乡民闻讯奋起，自发组织和武装起来，集结在蛇口溪西海岸迎敌，严阵以待。荷兰殖民者观望徘徊数日，见无隙可乘，悻悻离去。

与西方殖民者东来的同时，东亚的日本海盗（倭寇）觊觎我国东南财富，经常来到我国东南沿海劫掠商船和居民。明隆庆四年（1570 年），深圳大鹏千户所大部分官兵应总兵俞大猷之召出征倭寇，留守大鹏的兵力孤单。1571 年一股倭寇流贼突然来袭，乘虚长驱直入深圳的大鹏湾。然后架设云梯猛攻大鹏城，形势十分危急。守城的大鹏千户所官兵与出身军门的乡贤康寿柏率领的乡勇，协力同心抵抗倭寇。康寿柏临危不惧，登城指挥，屡次击退来犯之敌。军民斗志昂扬，坚守城池长达 40 多天。倭寇久攻不下，被迫撤退。大鹏军民保家卫国立功，受到明朝廷的表彰。

清朝承袭明代州县建置，而进一步加强了军事统治。驻守广东的有绿营兵和八旗兵。绿营兵由广东提督执掌，下设标、协、营、汛等编制。八旗兵由广州将军直辖，在滨江沿海要地设立镇、所，由总兵指挥。清初在深圳的南头、赤湾、九龙、大鹏等海防前哨均设置炮台，在赤湾建立海军基地，将大鹏千户所改为大鹏营，继又建立大鹏水师，负责珠江东线内外洋海面的防卫任务。后来大鹏营加强防务，扩充为左、右两个营，在鸦片战争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清朝顺治初年，为了切断东南沿海人民与郑成功、张煌言反清联合部队的联系，颁布了严厉的“禁海令”，不准商民船只出海贸易和外国商船前来贸易。接着又发布更为苛刻的“迁界令”，强迫沿海居民内迁 50 里。“迁界令”于康熙初年在深圳（当时叫新安县）推行，境内三分之二的土地被划入“迁界”范围内，结果新安县名存实亡，一度并入东莞县。“迁界”持续 23 年，深圳首当其冲，土地荒芜，

居民流离失所 饥荒严重 许多乡村饿死过半 哀鸿遍野“迁界”的暴政给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激起了沿海人民强烈的反抗，破产的农民、渔民、手工业者和商人，纷纷铤而走险，许多人出海逃生 不少人沦为“海盗”反“迁界”的斗争持续不断。直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清朝平定台湾之后 才宣布废止“迁界令”而“海禁如旧”。“迁界”和“海禁”是清朝倒行逆施的落后统治 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给经济、社会带来了破坏 同时也削弱了海防 因而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是与殖民活动相结合的，尽管在客观上对东西方贸易起了一定的沟通作用，但却是用血与火写下了殖民主义的侵略的野蛮和肮脏历史。深圳人民和中国人民一道英勇抵抗西方的殖民者和日本的倭寇，保卫了人民生命财产和海防；以及反对清朝的“迁界”和“海禁”的斗争 都是正义的进步的斗争 因而也是爱国主义的一曲高歌和壮举。

五、英国侵占香港与深圳人民的抗英斗争

英国殖民者早在 1793 年就开始向清朝政府提出给予“小海岛一处”的无理要求 遭到清朝政府的拒绝。中英鸦片战争中 蓄谋已久的英国侵略者终于在 1841 年 1 月 26 日公然出兵强占了香港岛（当时属新安县辖地）腐败的清朝政府在鸦片战争中战败求和 被迫于 1842 年 8 月 29 日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将面积 75.62 平方公里的香港岛割让给英国。从此英国殖民者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便有了据点和跳板。

英国侵占香港岛的阴谋得逞后，得陇望蜀，1856 年 10 月 27 日英法联军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侵略者早已垂涎尖沙咀一带的南九龙半岛，1859 年 10 月英国政府命令驻华英军司令“一有机会 即尽早占领那个半岛（南九龙）”。1860 年 10 月 21 日清政府又一次在刺刀的威胁下签订了屈辱的中英《北京条约》，将界限

街以南、面积 10.62 平方公里的“九龙司地方一区（即南九龙半岛）”割让给英国侵略者，从此英国侵华的据点，便开始从海岛向内陆推进了。

十九世纪末叶，英国侵略者又利用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失败和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趁火打劫，借口 1898 年 4 月中国被迫租借广州湾给法国，威胁了香港的安全，并于 1898 年 6 月 29 日强迫清朝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7 月 1 日实行，租期 99 年，从此深圳河以南、界限街以北、包括附近大小 200 多个岛屿，面积共 975.1 平方公里的北九龙半岛，即“新界”被英国强行租借了去。

至此，原属新安县辖地的香港岛、南九龙半岛、新界等总面积 1061.34 平方公里、约占新安县面积三分之一的我国神圣领土香港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成为英国殖民者侵华的一个重要基地和前哨。

1899 年中英还签订了一份《香港英新租赁合同》，作为《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补充，划定大鹏湾至沙头角（俗称桐芜墟）全长 51 公里海岸边界线，界线以南属港英当局管治。现在被称为“一国两制”和“购物天堂”的沙头角“中英街”就是其中一段边界线。这段边界线原是一段沙石河沟小道（当地居民叫鸬鹚颈）。西面是新界的盐寮村，东面是新安县桐芜墟的沙栏吓村。当划界时，沙头角边界共竖立 20 块界碑，其中中英街一段有 8 块界碑，每块碑高 72 厘米，上宽 30 厘米，下宽 36 厘米，界碑两面分别用中英文刻字，中文刻字是“光绪二十四年中英地界第 × 号”。中英街全长 250 米，宽 3 至 4 米，这里是从划界前的集市贸易到划界后的 20 世纪 30 年代出现初具规模的街道，而逐渐发展成街市的。中英街上竖立的 8 块界碑，至今犹存，深深地印下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屈辱的历史，留下英国殖民者侵略我国的铁证。

英国侵略者蚕食香港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反抗英国侵略者及其走狗清朝腐朽统治的过程。1839 年 7 月英国的水手在九龙尖

沙咀挑起事端，打死当地居民林维喜，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拒不交出凶手，蓄意制造战争借口。抗战派林则徐下令大鹏营参将赖恩爵率领水师巡船 3 艘迅速进驻九龙寨 布防九龙湾 准备迎击来犯敌人。9 月 4 日义律亲带兵船 2 艘、武装商船 10 艘 向九龙山口岸的清军巡逻船发起突然袭击，赖恩爵临阵指挥，尽管双方力量对比悬殊 但他指挥若定 身先士卒 亲自点燃炮火还击敌人 经过 10 多个小时的激战，击沉英国侵略者的双桅船和舢板各 1 艘、打死英军 17 人，英军船长得忌刺士被清军炮火击中重伤，阵脚大乱，清军乘胜追击，英军船舰落荒逃窜。九龙海战是中英鸦片战争的前哨战，赖恩爵指挥清军以少击众，取得了首战告捷的辉煌胜利。赖恩爵是新安县大鹏人，自幼随父从军，历任大鹏营参将、龙门协副将、南沃镇总兵等职，是一位屡立战功的爱国将领，被道光皇帝授予“呼尔察巴图鲁（勇士之意）”称号，后升任水师提督，被清廷授予“振威将军”其大鹏故里“振威将军第”和墓园 以及抗英名将赖恩爵纪念碑，均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表达了后人对他的崇敬和怀念。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 英军 3000 多人曾于 1859 年 8 月 11 日入侵新安县城南头，新安知县王寿仁和驻守县城的虎门水师右营游击麦镇邦指挥守城的军民奋力抵抗，英军付出沉重的代价一度攻入县城并破坏了县衙和火药库，同时到处烧毁民房和劫掠财物，但在南头爱国军民拼死抵抗下，打死英军 100 多人、打伤几十人，英军损兵折将惨重，不得不撤离南头，逃回海上。

1898 年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签约后 英国不仅加紧对香港进行殖民活动，而且得寸进尺，把侵略魔爪伸向深圳内地，从而激起了深港人民的不断反抗。原来粤港双方商定交接新界租地时间是 1899 年 4 月 17 日，但英国殖民者迫不及待提前入侵新界的大埔墟，强迫迁界内居民提前呈验印契，这无异于火上加油，原来划入新界的几万户中国居民不愿离开祖国的怀抱，对英国殖民者

提前闯入新界的殖民活动更是义愤填膺和坚决反抗。4月15日英军1000多人突然进踞新界的元朗、锦田、大埔等地，升挂英国国旗。当地居民早已做好准备，他们在1899年1月就公推元朗厦村邓仪石等24人为领导，组织武装队伍，集资购置武器弹药、修筑工事、加固隘寨、处处布防，誓死保卫家园。英军武装入侵后，邓仪石领导的抗英斗争声势浩大，4月18日他们在东莞雁田人民组织的一支500多人武装队伍的支援下，同仇敌忾，并肩合力抗击来犯的英军。经过激烈的战斗，英军指挥造歪被枪击中落马，下胸中铁砂7颗，狼狈逃命。邓仪石指挥抗英武装兵分三路同时出击，居高临下，发起凌厉的攻势，终于把来犯的英军击败、赶下海滩，惶惶撤走。不甘失败的英军又于5月5日卷土重来，他们厚集兵力，配备精良的枪炮，采取各个击破，步步深入的办法。邓仪石指挥的抗英队伍虽经浴血苦战，但终于寡不敌众，不得不撤离大埔、锦田、元朗等地。

5月17日英军占领新界后，千方百计妄图进一步扩大“新界区”，他们肆无忌惮地越过深圳河北岸，强行占领深圳墟及其附近的村庄之后，继续向北推进，把侵略魔爪伸向布吉，扬言还要打到东莞石龙去。东莞各地人民闻讯纷纷集合起来，组成一支3000多人的武装队伍，开赴前线，与深圳的人民并肩作战，严惩入侵的英军。并在占据的山险修筑20多里长的工事，从虎门调来100多门大炮，利用英军人地生疏的弱点，发动夜战，结果大败英军，收复深圳，把侵略者赶过深圳河以南的新界。英军的嚣张气焰被压了下去，不敢再进犯深圳了。深圳人民在东莞人民的支援下，站在反对英国殖民者侵略的最前线，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维护了祖国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表现了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决心和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六、九龙海关今昔

九龙海关是目前我国最大的海关之一，世界各国外宾、海外华侨、港澳台同胞经九龙海关出入境和祖国内地人员赴港出访经九龙海关出入境，近年高达 3000 万人次以上，成为我国的南大门和南风窗。

九龙海关已有百多年的历史，原名叫九龙关，因最早设于九龙半岛而得名。九龙关的开设是与鸦片走私贸易有直接联系的。光绪十二年（1886 年）清政府与港英当局签订《管理香港洋药（鸦片）事宜章程》，规定由清朝设立九龙关，并于次年（1887 年）3 月 9 日正式成立，专司稽征鸦片税厘等事宜。为便于执行章程有关条款，关署驻香港岛上的维多利亚城皇后大道中 16—18 号银行大厅二楼，由英人赫德出任税务司，下辖急水门、九龙城、长洲、佛头洲、深水埗等 5 个关厂，员工共 273 人，除外籍员工 23 人外，其余均为华人。

由于九龙关总关设在香港，中港海陆执行清查走私任务，港府执行酒类征税法令，双方有着特殊的利益关系而互相配合。同时，九龙海关与其他海关口岸比较又有着特殊的地理环境，所以没有兼管邮政、港务、航运、检疫等业务，却兼办代征地方税捐和代理签发出国护照的业务。

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7 月 1 日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生效，英国强行租借新界，于是中国边界被迫内移，九龙属下的关厂也不得不内迁到新建的大铲、伶仃、三门、沙鱼涌、东澳等 5 个海上税收关卡和赤湾、车公庙、龙津墟、沙头角、盐田、溪涌、叠福、下沙等 9 个陆上缉私关卡，称为“九龙新关”。从此整个九龙半岛置于九龙关之外。同时由于边界内移后，陆上边界线由原来 2.5 英里扩展为 60 英里，海上边界线也由原来 20 英里扩展到 80 英里，缉私任务大大加重。以后又陆续增设深圳河、罗坊、南澳等关卡，并在盐田